



Title	關於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論壇《共同進化的現代中国研究》
Author(s)	田中, 仁
Citation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2011, 2011-12, p. 1-6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13517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11-12

关于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共同进化的现代中国研究》

田 中 仁（单晓文 译）

关于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共同进化的现代中国研究》^{*}

2011 年 10 月 5 日

田 中 仁[†]（单晓文[‡]译）

^{*} 本稿は 2011 年 8 月に中国・内モンゴル大学で開催された第五屆現代中国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研討会「百年中国與周辺地域」における基調報告を改訂したものである。

[†]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tanakahi@law.osaka-u.ac.jp）

[‡] 大阪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

前言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 是由大阪大学中国地域研究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员, 以及各位毕业后在其他大学和研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是一个旨在推进和深化作为地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中国研究的跨学科和校际合作形式的平台¹。

《共同进化的现代中国研究: 中国地域研究的新平台》(田中仁 三好惠真子编 预定公开出版) 是该论坛联合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 立足于从 2007 年起每年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现在中国的社会变貌和东亚新格局”达成的共识并精选研究交流的汇报², 作为“共同进化”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公开发行。

“共同进化”原本是生物学范畴的用语, 是指“多种生物种类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向提高适应环境能力的方向进化”。也就是说, “共同进化”是指由于相互进化使其所处的环境得到了持续性的变化, 因此与单独进化相比可以激发学术交叉和相互借鉴。

本国际研讨会的例会制度化的推行³促使学科交叉的研究者积极思考如何与历史学家进行连续性的对话, 本书也将围绕这种对话的意义进行探索。

本书的主题线索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点, 关于历史学和诸学科之间的对话, 一方面需继续关注中国 20 世纪史与现代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另一方面针对 21 世纪“全球性大国・中国”浮出水面的现实, 借鉴和对比各个学科的“解读”, 追求“对话”的可能性。虽然在于各部分(三个视点)上分别安排中国 20 世纪史(历史学)和围绕 21 世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论点介绍, 但是也要求作者在论述上作了调整, 方面历史学和诸学科双方的读者都易以理解。

第二是怎样构建一个围绕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推动研究和对话的新平台的问题。我们认为东亚校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是突破国境的隔阂, 促进相互信赖和增进相互理解的有效的方法。同时 21 世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出现, 超越了中国专家这一狭小的圈子, 构建一个可以让各种领域的研究者交换意见的平台也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区域研究的新平台》的理由⁴。

第三点彰显日本的中国地域研究的个性和特点的问题。在现在和过去, 过去和将来之间如何搭桥这个问题上, 我们仍要从作为东亚大国关系的日中关系这一视角上重新探讨, 与此同时也必须促进各个学科关注从矛盾・竞争・对立到协调・共生・成长的“共同进化”的研究动向。拥有日本特色的现在中国研究必定会为我们发现新的可能性指点迷津。

本书设定了与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出现和东亚关系相关的三个视角— a. 20 世纪中国的轨迹的连

¹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的前身是以大阪外国语大学专攻中国“文化”(历史, 政治经济)的教员为核心成员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2007 年 10 月与大阪大学合并后进行了适当的改组和扩充, 力图在大阪大学打造一个以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地域研究为切入点的跨学科校内研究・教育的平台。

² 研讨会在 2007 年 8 月于南开大学召开之后, 又分别在 2008 年 8 月于东华大学, 2009 年 8 月于大阪大学召开。之后更名为“现在中国与东亚新格局”, 在 2010 年 8 月于赣南师范学院(中国江西省)召开了第 4 次研讨会。田中仁・江沛・许育铭编《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第 1 辑》(近刊)是根据 2009 年大阪会议提交的论文编成的汉语论文集(44 篇论文, 44 万字)。

³ 在“学术交流备忘录”(2009 年 8 月)之后, 作成“关于三地学术交流的协议”(2010 年 2 月), 并且着手建立了组委会。“三地”是指日本, 中国, 台湾。

⁴ 关于中国 20 世纪史, 已经公开出版了《丛书 20 世纪中国史》(东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关于历史研究者和现代中国研究着的协作用了《中国的问题群》(岩波书店 2009-)等珍贵的成果。并且不只局限于中国问题专家的小圈子讨论, 力求构建一个围绕着现代中国研究的开放型学术舞台。

续性的视角，b.从台湾·蒙古或华侨·华人等“周边”出现的问题所在的视角，c.注视日本在通时、共时的定位的视点，与此同时本书也注重将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的特点通过中国 20 世纪史研究（历史学）与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学术对话加以提炼。

以下是本书的章节。

<p>序 章 歴史学の諸学との対話（田中仁）</p> <p>第一部 グローバル大国・中国を透視する</p> <p>第 1 章 社会の近代的再編 江沛（天津・南開大学）：交通システムと近代山東における経済貿易重心の転移</p> <p>第 2 章 権力の正統性 西村成雄（放送大学）：1946 年民国政治：憲法制定権力の正統性流出</p> <p>第 3 章 躍進する経済 許衛東（経済学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における中国経済空間の変容と東アジア分業体系</p> <p>第 4 章 軍事的台頭 竹内俊隆（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中国軍の現状と日米同盟への見方：海軍および第二砲兵隊を中心に</p> <p>第 5 章 人間の安全保障 三好恵真子（人間科学研究科）：中国の環境問題をどう捉えるべきか：サステナビリティ学の実践的展開を目指して</p> <p>第二部 周辺を見つめる</p> <p>第 6 章 1920 年代の内モンゴル 周太平（内モンゴル大学）：郭道甫（メルセ）とその時代：1928 年フルンポイル青年党蜂起を中心に</p> <p>第 7 章 1950 年代の台湾 許育銘（台湾・東華大学）：戦後台琉関係の再構築：1957 年前後を中心に</p>	<p>第 8 章 エスニシティの境界と可塑性 木村自（人間科学研究科）：中国における「民族」論の今日の展開：「族群」の政治性・「民族」の可塑性</p> <p>第 9 章 華僑・華人とローカルナレッジ 宮原暁（グローバル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漢族の民俗知識と人間の安全保障：セブにおける北斗娘娘信仰をめぐる</p> <p>第三部 日本の立ち位置を凝視する</p> <p>第 10 章 戦争と社会 丸田孝志（広島大学）：日本傀儡政権・中国共産唐根拠地の記念日と時間</p> <p>第 11 章 中国革命と日本 田中仁（法学研究科）：ポスト革命時代の歴史叙述：革命の語り，戦争の記憶</p> <p>第 12 章 文化の越境と相互浸透 青野繁治（言語文化研究科）：欧米および日本のロックに見るチャイナインパクト：併せて，中国ロックに見る海外インパクト</p> <p>第 13 章 社会協働と交流 日野みどり（同志社大学）：配偶者との死別後の悲嘆ケアシステムを中国に構築するために</p> <p>第 14 章 国際関係と地域秩序 山田康博（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の変容：冷戦秩序から多国間主義の秩序へ</p> <p>終 章 21 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間の安全保障構築に向けて（三好恵真子）</p>
---	---

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各部分别对应以上三个视角。另外在每个部分的前半部（1，2，6，7，10，11 各章）中安排了历史学的论述，之后又收入了各个学科的论述（第一部=第 3 章・经济地理学，第 4 章・安全保障论，第 5 章・可持续发展学；第二部=第 8 章・人类学，第 9 章・人类学；第三部=第 12 章・文化学，第 13 章・社会学，第 14 章・国际关系论）。

以下是通过学科之间的“对话”提炼出来的主要内容。

I 透视全球性大国・中国

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化大国・中国喷薄而出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完全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变化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合力所成的。把握中国发生的结构性社会变化的实质，其实也就是把握 20 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这就需要立足 100 年为单元的历史框架重新梳理 20 世纪中国与 21 世纪中国之间的发展连续性。

中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化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显著发展和东亚国际分工的重组（许 ），远洋海军的

建设和核战力的配置（竹内 ），以及由于“世界的工厂化”引起的其他国家的环境负荷=显著环境恶化（三好 ）。

江沛在关于以烟台·青岛的开港为开端的近代山东社会的变化的问题上是这样叙述的。“经济贸易活动从以地区的自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要求的，从而出现了新型交通运输业的形成，商业规模的急速扩大，以及近代工业生产的兴起。由于生产力的革新带来而的世界经济体制的重组，造成了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构造变化。”（江 ）这一点明确了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化的起点。

关于 1946-49 年的国共内战，西村成雄是这样描述的。“由武装政党之间的武力引起的兵争的过程，尽管来自于国民社会层次的深度如何，但是该过程一定以达到政治协议为前提而展开，虽然称其为武装政党，但在确保政治主导和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上有着决定意义的重要性（西村 ）。在这里西村是围绕着 1946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政治过程和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利的正统性进行了论述，但是它的射程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演进的全过程。其实，人民共和国的 60 余年，也是基于 54 年宪法和 82 年宪法宣示的权力正统性如何获取国际以及国内认同的过程。这样看来，竹内提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的问题（竹内 ），或者是三好指出的政府的环境行政和其实际状况（三好 ），也是对接以上历史脉搏的课题。

II 从周边注视

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促进了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化。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重要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逐渐显著的全球化发展。这不仅迫使中国自身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大大影响着中国周边的地区·民族与中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互渗透的方式。现在的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形成，显然源于以近代朝贡关系的丧失与华侨的输出，香港·台湾的殖民地化，清朝版图的继承，还有冷战时期的国家分裂等历史背景，但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相互渗透并不断变化和深化。这使得继续套用“国民国家”的框架和概念来理解中国和东亚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本书将着眼与在中国周边的地区和民族与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关系。

根据现代中国自己的定义，中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定义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中的民族范畴划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定义，民族的边界也成为了不可跨越的障碍，并且人们认为各民族是从太古时期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木村自介绍了当今中国人类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和 56 民族关系的争论——一方将“中华民族”称为 nation（民族），将 56 民族称为 ethnicity（族群），提倡后者的“非政治化”，而另一方认为这种见解是歪曲了各民族国内共存这一关系到国家政治主体相关的问题（木村 ）。

可以说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近代中国是怎样发现了“民族”，并且是近代以前的中华帝国体系和国民国家的原理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这一关键问题。说到关于中国和周边的关系，当前以下几点非常重要。A. 近代以前东亚的国际秩序（朝贡），B. 清朝帝国体系的构造（理藩院=蒙古·回部·西藏），C. 近代国际关系的重组（特别是日本殖民地帝国和东亚），D. 沙俄革命和东亚（特别是蒙古革命），E. 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和东亚（特别是中台关系）。1928 年的呼伦贝尔青年党起义和 1958 年中琉经济文化协会成立都不一定是同时代引起众人关注的大事件。尽管如此，两者都把涉及到中国和周边关系的极其重要的节点连接起来（周太平 ，许育铭 ）。

据推测海外的华侨·华人有 2500-3000 万人。中国人的海外移民中多数是 1860 年到 1941 年从

广东·福建省出国的约 1000 万人的子孙，其中 80% 居住于东南亚。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政府放宽出国管制，出国人数剧增，其中一部分人在海外定居（新移民）。宫原晓以菲律宾·宿雾华人社区的“北斗娘娘”信仰为线索，追述了汉族移民女性的“人类安全保障”的立脚点源于民俗认知（local knowledge）的考证发现（宫原晓）。中国对“民族”的发现起源于明末，这与宫原提出的汉族的民俗认知有着怎样的关系，也是“从周边凝视”中国的必不可少的探讨课题。

III 凝视日本的立脚点

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出现不可能不带来东亚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21 世纪的东亚地区将迎来一个充满着对立和纷争的时代呢？还是迎来一个经济繁荣且国际关系安定的时代？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实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的见解（Friedberg2005;Kang2007）。正如 2005 年的反日游行和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当今的日中关系很容易被政治化而成为敏感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将 20 世纪的日中关系纳入历史整合的视野继而点评作为构成当今东亚国际格局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日中关系的内涵，是极其重要且时不我待的课题。

毫无疑问，在我们对日中关系的理解范式中如何定位日中战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将中国共产党（中共）指导人民“抗日”视为最终带来了 1949 年革命胜利的说法，是解释中国革命的基本调子。80 年代以后，有关革命的话语和战争的回忆为适应“改革开放”战略的需要被加以少许改动而重新定位。相比之下，日本学界对 49 年中国革命的评价，从 80 年代到经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其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田中）。

正如山田所指出的那样，在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基于谋求多国参与的多边协商框架的思潮的出现，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协商中心和对话窗口的东亚国际秩序。由此，21 世纪的东亚从以冷战时期的美国作为连接点形成由“点和线”组成的以两国双边关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转变为拥有“面”状的范围基础以及由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协议框架（山田）。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推出全面市场化的发展战略，并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协商机制，随后在 2001 年加入了 WTO。我们可以把 21 世纪的中国看成是后革命时代，但是也有必要在这些历史变化的脉搏中理解“战争·革命”与日中关系的联系。

显而易见，重新辨析或重组中共指导“抗日”并最终引导革命胜利的认识范式是非常重要的。丸田论述了日中战争时期华北傀儡政权和中共根据地的纪念日活动和日程安排的真实情况，与上述的认识结构相关并提出了新的视角。丸田对国家·国民意识的形成（和民俗的强韧性）的论点紧扣 20 世纪中国历史形象的座标重塑的意图再述了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轨迹以及战争和革命的问题（丸田）。山田指出了由于当今的中国·日本·美国的三国关系中日中关系的问题最多，日本有必要在历史认识问题和关于战争责任·殖民地统治的责任问题上更加重视自己的责任（山田）。在指出历史责任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留意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置于考虑的范围之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不可能成为联合国采取的任何一种强制措施的对象，并且在防止核扩散条约中被公认为核武器拥有国，中国成为核武器拥有国是在承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联合国方的主要国取得胜利的历史通道的基础上实现的，尽管如此，由于中国革命把国民党政权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并作为打倒对象，如此，围绕革命与战争的现代中国认识框架里这一点被完全舍弃⁵。

⁵ 就人民共和国而言，1971 年联合国决议承认其合法席位（台湾退出）和 79 年的中美建交是促成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发生转变的决定性的转折点。

20 世纪的日中关系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通上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完全有必要将这些历史事实进行整合归纳，构筑一个不以“战争”为时代划分而更具内涵意义的日中关系史的真实形象（久保等 2008，山田辰雄 2007）。不论是摇滚音乐的扎根和渗透现象（文化的越境和互相渗透，青野 ），或者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互助和交流，日野 ）在“后革命社会”的 21 世纪的中国都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由此衍生的日中之间的各种联系必然汇集到上述的日中关系史的层面当中。

总结

百年中国的历史轨迹始终贯穿了实现国家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和争取国家富强的发展标向。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国家现代化（制度化）的进程仍处在现代进行式，同时我们也应该认同有关全球性大国化的当代中国，以及日中关系和东亚地区秩序的诸课题多数是在以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格局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三好就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研究（三好 ），宫原就菲律宾・宿雾岛的华人社会的民俗认知的研究（北斗娘娘信仰）（宫原 ），日野就配偶生死别离后的社会关爱的研究（日野 ），都对构成当今东亚国际公共财产基础之一的“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提示。

如果将针对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和全球性大国化的问题所展开的历史学与相关诸学科的对话视为“过去和现在的对话”的话，那么，将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化的中国内蕴的各种课题纳入“人类安全保障”的视野并依托历史座标探讨其演进的特点和规律则可视为“过去和未来的各种目的之间的对话”（Edward Hallett Carr）。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共進化する現代中国研究』について

田 中 仁（単曉文 訳）

Introduction to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e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Co-evolution*

TANAKA Hitoshi (trans. SHAN Xiaowen)

要 旨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は、中国地域研究あるいは現代中国研究を共通項とする学際的かつ学科横断的な研究グループである。『共進化する現代中国研究：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田中仁・三好恵真子編として公刊予定）は、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が天津・南開大学歴史学院、台湾・東華大学歴史学系とともに、2007年から毎年開催してきた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容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において実現した研究交流をふまえて、その成果を問うものである。

本書は、グローバル大国・中国の出現と東アジアの関係に関わる三つの視点——a. 20世紀中国の軌跡との連続性を問う視点、b. 台湾・モンゴルや華僑・華人など「周辺」から問題の所在を問う視点、c. 通時的・共時的な日本の位置どりを凝視する視点——を設定するとともに、地域研究が有する学際性を中国20世紀史（歴史学）と諸ディシプリンとの対話という方法として紡ぎだす試みである。

本書をとりまとめるにあたって、以下の三点に留意した。

第一に、歴史学と諸学との対話に関して、中国20世紀史においては現代の課題との関連性を意識することに注意をはらい、他方、21世紀「グローバル大国・中国」出現のありようについては個々のディシプリンをふまえて「語る」ことによって、「対話」の可能性を追求することである。

第二に、現代中国研究をめぐる研究と対話の新た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どのように構築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東アジア学校間交流というアカデミックな対話が、国境による壁を相対化し相互の信頼醸成と相互理解を促進するための有効な手段であろう。同時に21世紀「グローバル大国・中国」の出現によって、中国専門家の狭いサークルを越えて、さまざまなディシプリンをもつ研究者による意見交換を可能にするプラットフォーム構築の必要性が焦眉の課題となった。

第三に、日本の中国地域研究の「個性を押し出す」ことである。現在と過去、過去と未来をどのように架橋するかについては、当然東アジア大国関係としての日中関係という視点から再検討が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同時にそれは矛盾・競合・対立から協調・共生・成長に向けての「共進化」を促す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担当委員（許衛東）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